

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

——中国文学翻译作品“走出去”的实践启示

李火秀 张国亮

社科论衡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作为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中国文学翻译作品“走出去”显得尤为重要。

文化转向是备受关注的国际性学术思潮,不仅为译学研究打开新视野,而且,为中国文学翻译“走出去”奠定坚实的理论支撑和逻辑话语基石。文化转向萌芽于上世纪70年代埃文·佐哈尔提出的多元系统论和图里提出的描述翻译学。上世纪90年代,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维尔等学者倡导文化翻译观。安德烈·勒菲维尔的著作《翻译、历史与文化》的出版,标志着译学研究文化转向的兴盛。文化转向焕发出了巨大的活力和学术生产力,其核心要义是将翻译研究放置到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不仅关注翻译的内部研究,而且关注翻译的外部研究,强调社会、文化、历史、政治等对翻译的影响。因此,阐释文化转向对于新时代文学翻译“走出去”的意义、启示,对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语言到文化:文学翻译的顺势而为

文化转向的重大意义是为我们提供了比传统语言研究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和新的阐释模式。它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文学翻译并不仅仅是单纯语言间的转换或再现,同时也是文化彰显与文化重塑。文化转向为中国文学翻译“走出去”开辟新的多元视野与文化通道,从译者、译作、读者等方面铺开崭新的观照路径。它将翻译视为一种文化实践,强调翻译活动中的文化因素和历史规约,注重翻译与译文社会的历史、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关系。

文化转向提升译者主体性功能发挥。译者忠实原作仅是其中一个面向,还力图厘清译作如何在目标文化中传播和接受,以及如何处理

文化差异和文化身份问题。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关注目的语文化特点,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和表达方式。在译文内容方面,着力打破翻译界以往的陈规,从语词文本转向文化场域,关注译文在目标文化中的接受和影响。读者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读者不再是被动接受信息的对象,而是翻译活动中的重要参与者。他们能够影响、推动、引导翻译策略的选择,并在一定程度上操纵翻译活动的发生。这种变化体现了文学翻译从以原著及作者为圭臬逐步过渡到重视读者的地位、读者反应等因素。

翻译的文化转向顺应了中国翻译学跨学科的突围与研究疆域向外延展的诉求,应时而生,意义不容忽视。正如译学界专家谢天振教授敏锐指出的:“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翻译的对象除了传统的纸质文本外,还涌现出了形形色色的网状文本,也即所谓的超文本(Hypertext)和虚拟文本(Cyertext);翻译研究的对象变得更加丰富、复杂和多元,口译、翻译服务、翻译管理以及翻译中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等问题都成为了当代翻译研究中的热点对象,等等。由此可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正好迎合并印证了当前翻译时代的演变与发展的总体趋势。”因此,中国文学翻译作品“走出去”,要求我们具有更开阔的视野重新定义翻译、审视翻译,同时,也要求我们能够“超越文本”,超越翻译本身的束缚而重新建构一套话语体系。

从“走出去”到“融进去”:文学翻译的重构之力

中国文学翻译作品“走出去”,不仅传递原作的思想文化内涵,而且,作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其意义在于让世界读者领略中华民族的文化个性与艺术魅力,让世界读者了解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彰显文学翻译的重构之力。事实上,文学翻译作品从“走出去”到“融进去”并非易事。长期以来,译学界对“直译”“意译”“归化”“异化”等翻译方法的用词置陷于两难境地。文化转向对文学翻译的重要启示是强调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传递、接受和重构的过程。文学翻译不再单纯追求语言上的“忠实”,而是更加注

重译文在目标文化中的接受度和影响力。从这个层面上,中国文学翻译从走出国门,到被他国读者认识、熟悉、理解、尊重和认同,这一过程是一个系统、长期的工程,不能一蹴而就。在这一过程中,文学翻译的重构之力得以浮出“地表”。

译者在文学翻译中,需要较高的思想和艺术水准来探索并构建中国故事国际化表达的语义空间与符码系统,赋予民族的即是世界的、中国的即是世界的认知高度,向世界读者展示民族审美、情感、精神和思维方式等。文化转向赋能中国文学翻译以新的阐释方式,以实现对翻译主客体间的“对话”“调适”和“认同”等“星从”问题的解答。因此,译者需要寻求文化“平衡点”,即寻求人类、人性的共同点与共通点,尽量减少由读者认知、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理解问题。例如文化负载词的处理即是一个挑战,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处理具有强烈文化特征的词汇是关键。较常采用转写加注的方式或词汇“改写”以适应文化在地性等本土化策略,都是使外国人能够理解其文化背景和含义的良方。

译者的态度是客观中立的,需以跨文化视角站在融通中外立场上,寻求中外两种文化的共同点,从而增强读者对不同文化的包容和尊重。例如科幻小说《三体》走红海外,成为中国当代科幻的代名词,是中国文学收获世界性声誉的代表作之一。其最根本的原因即是能够以跨国界、跨文明的视角审视全球人类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境遇,从而引起读者深层次的共情。

文学翻译从语言转换到文化传递的转变,推动了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舞台,促进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大交汇、大融合,这无疑是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

同时,文学翻译在呼应他者的审美期待中沟通中西文化,拉近了审美距离,使译作的思想内涵得以扩容,进而再异域接受中焕发光彩。

从交流到互鉴:文学翻译的时代使命

文学翻译促成不同样态的文学作品世界“旅行”,使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读者跨越语言的河流,增进了解、沟通情感,从而促成深层次的文化认同。文学翻译通过引进和输

出异质文化,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版图得以拓展,并获得世界文学的标识。一方面,文学翻译在传递异域文化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精准的翻译,将外国文学作品中的独特文化元素、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呈现给国内读者,促进文化的多元融合。自近代以来,严复、林纾、梁启超、傅雷、季羡林、朱生豪、许渊冲、杨绛、钱钟书等翻译家不遗余力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使中国读者能阅读世界经典作品,汲取外国优秀著作甘露。例如傅雷的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作品超越时空,影响深远。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译作中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激励国人拳拳爱国心和报国志。由此,他的翻译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具有深厚的文化思想价值。

另一方面,通过翻译,能够将中国优秀文学作品推向海外,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当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首要的任务是加快突破“卡嗓子”难题。因此,文学翻译担负着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即展现中国文化的自信与自强,切实提升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力、影响力和号召力。近年来,通过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等,对外翻译推广力度不断加大,与国外出版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签订出版协议,推动大量中国图书在海外的翻译出版。如“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为作者、译者和出版社提供合作与交流平台,促进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最能够直抵人心,因此文学是易于被理解被共情的艺术样式。文学翻译的价值和魅力在于将这种通达人心的力量传递给不同国家、不同母语、不同文化的读者,从而增强对不同文化的包容、尊重和认同。全球化时代,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文学翻译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应该并且可以承担维护不同文化和谐共生的重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这是时代赋予译学界的重大使命。

【作者单位分别为江西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浙江总站】

共同富裕视野下的特殊职业教育发展路径

李桂枝

专家观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强化特殊教育普惠发展”。近年来《“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特殊教育办学质量评价指南》等文件相继出台,彰显了党和政府对推动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视。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特殊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残疾人受教育水平,帮助残疾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坚持党建引领,让党建和业务工作深度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高校作为人才培养与各类人才聚集的高地、技术创新的主阵地,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特殊职业教育应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和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不断提高高校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抓班子、带队伍、保落实的能力和定力,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一是以党建引领落实“四个融合”。即推动党建与教育事业、师生需求、属地党建相融合,与高校内部党建工作体系相融合,促进高校党组织更好融入并统领治理架构,推动党建与高校事业发展互促互进。党建与特殊职业教育业务考核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构建“考评党建看发展、考评全局看党建”的联动式评价机制,推进国家级、省级高校党建工作“样板支部”、省级高校党建

工作“标杆院系”、省级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特教事业全面发展。二是以党建引领实施助残共富。立足服务残疾学生个性化发展、多元化成长和多样化成才的需求,鼓励学生参加各类职业技能比赛,提高专业技能,推动残疾学生高质量就业。完善校企共建党建机制,打造特殊职业教育集团,推进学校与区域、企业发展同向发力,多方联动,挖掘残疾人就业岗位,为残疾学生就业保驾护航,帮助残疾学生和全国人民一道走向共同富裕。三是以党建引领教师队伍建设。落实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以强化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建设为首要任务,聚焦聚力高水平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遵循特殊教育规律和教师成长规律,构建一支结构合理、师德高尚、专业精湛的“双师型”教师团队。常态化开展师德师风教育,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加大力度选树先进典型案例,扩大榜样的辐射引领作用,弘扬“教育家精神”,为特殊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坚持立德树人,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应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一是根据学生特点,构建“残健融合”大思政体系。结合特殊职业教育特色,开设《助残情怀》等特色公共选修课,形成“必修+选修”协同发展的思政课程体系,充分发挥思政课程

和课程思政的“助推器”作用,引领残疾学生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完善立德树人学生综合评价体系,保障人才的培养质量。二是结合专业特色,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立足培养残疾高级技能人才和服务残疾人事业专业人才的办学特点,构建高水平专业群,推进现代学徒培养,开展省级现代学徒制试点,与本校高校开展本科联合人才培养,与特殊学校和普通中职学校开展中高职一体化五年制贯通培养。以课程为统领,推进“三教”改革,优化课程设置,提高课程质量,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使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三是整合校内外资源,打造质量师德师风建设为首要任务,聚焦聚力高水平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遵循特殊教育规律和教师成长规律,构建一支结构合理、师德高尚、专业精湛的“双师型”教师团队。常态化开展师德师风教育,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加大力度选树先进典型案例,扩大榜样的辐射引领作用,弘扬“教育家精神”,为特殊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坚持残健融合,助推残疾学生融入社会

特殊职业教育的落脚点是帮助残疾学生习得一技之长,主动融入社会并能体面就业,活出精彩人生,成为社会的有用之人。残疾学生常常由于身体残缺,自卑敏感,自我封闭,不愿主动与人交往,因此残健融合的育人模式显得尤为重要,更是融合教育理念在特殊职业教育领域的实践必需。教育部出台一系列融合教育的相关文件政策,以顶层设计的方式强调了融合教育的意义。残疾学生只有和健全学生融合在一起,残健

【作者为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组织部部

知名专家说

黄仁伟: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特聘教授,兼任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智库研究中心理事长兼主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等。参与“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等课题研究,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著有《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崛起的时间与空间》《国家主权新论》等专著及大量论文和研究报告。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全球南方』

黄仁伟

当今时代,文化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要素。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在大力发展硬实力的同时,也积累了雄厚的文化软实力,控制了传媒、影视、出版等文化行业,垄断了解释世界的权力。西方国家所主导的话语体系,先天地带有一元性和排他性的特点,对于文化和制度上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中国长期采取一种污名化、妖魔化的话语策略。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想象的共同体”概念,指出民族是社会建构的共同体。新闻传媒和文化产品参与了建构的过程,并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西方文化霸权的长期塑造下,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第三世界国家,许多民众所认知和想象的中国形象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扭曲的、不真实的,这种刻意的歪曲和抹黑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面对西方国家的“认知战”“舆论战”,我们如何让世界了解真实客观的中国,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我认为需要将视野更多地朝向西方世界以外的“全球南方”。习近平主席在“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深刻指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全球南方”不仅拥有着世界大多数的人口,近年来也日益成为推动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力量。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推动中华文化走向“全球南方”,是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的必由之路。事实上,在“全球南方”,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已经开始超过西方文化。

中华文化能够走向“全球南方”,首先在于中华文化突出的统一性。中国辽阔的国土上分布着众多少数民族,灿烂多彩的民族文化造就了中华文化内在的跨文化属性,使其更容易兼容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例如,中国的影视剧不仅在临近的东亚、东南亚等地打开了市场,而且现在非洲不少国家的老百姓每晚也守在电视机前“追剧”,甚至可以说,中国影视剧在当地的受欢迎程度丝毫不逊色于好莱坞电影。

其次,从“全球南方”的角度来说,大多数南方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残酷的殖民统治以及随后漫长的去殖民历程。中国作为其中一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不仅较早摆脱了殖民文化的束缚,还让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站稳了脚跟。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对其他南方国家起到了积极的引领和示范效应,中华文化能在广大的亚非拉地区收获共鸣,反映了“全球南方”渴望走出被压迫命运的共同文化心理。

另外,“一带一路”的持续建设有力助推了中华文化的崛起。在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民众的“心联通”方面,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带一路”上的文化交流互鉴在各个维度上展开。例如,在各个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施工队、各所中国高校里的亚非拉留学生、在雅万高铁上工作的乘务员等,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文化传播大使。当西方媒体还在挖空心思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时,中华文化已经借助“一带一路”上个体点滴的实践,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当然,这一过程目前还面临着一些难题。比如,我们能够“走出去”的文化产品数量还是不够多,尤其是能够反映不同地区文化特色和文化需求的产品。

未来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向“全球南方”?我想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我们要始终秉持开放的姿态与包容的胸怀。与中国的遭遇类似,大多数南方国家在世界上常常处于失语的状态,它们的形象也是任由西方世界“塑造”,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我们在展现中华文化的同时,也有必要给这些南方国家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发声平台。其二,我们要进一步推进数字技术和文化传播的结合。网络时代以来,数字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文化的传播早已突破传统媒介能够覆盖的狭小范围。加强对数字技术,特别是当下人工智能技术的利用,助力中华文化更广、更深、更好地走出去,这个方面可以大做文章。

(本报记者 张竞聪 整理)

观点万花筒

统筹好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近日在媒体发文指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统筹好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

一是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培育和发展更有活力、竞争力、创造力的市场主体。一方面,要继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当前,更重要的是强调和致力于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以及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如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完善民营经济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保护民营企业家产权,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着力监督纠正“远洋捕捞”等异地趋利性执法现象。其关键还是要保证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二是构建高标准全国统一大市场,否则就不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围绕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这项改革任务的关键是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坚决破除行业垄断、消除制歧视,地方保护和市场壁垒,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重点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违法违反给予政策优惠行为。

三是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种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活力充分释放。完善主要由市场供给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防止政府对价格

形成不当干预。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四是完善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包括完善产权制度,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查同罪同罚,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制度、社会信用制度等。

五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包括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协调机制,围绕实施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和重大战略,促进财政、货币、竞争、产业、就业等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程度。同时,还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健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

六是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在制度开放方面,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和金融领域实现规则、制度、管理、标准相通相容。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方面,要强化贸易政策和财税、金融产业政策协同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市场有序扩大开放。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稳妥推进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金融领域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